

闻道思齐

「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主 编◎周桂钊

执行主编◎李春颖

【第三辑】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南道思齐

「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第三辑】

主 编 周桂钿
执行主编 李春颖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闻道思齐：“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第三辑/周桂钿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7-5620-7726-8

I. ①闻… II. ①周… III. ①儒学—研究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5046号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289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目 录

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郭 沂	1
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彭永捷	33
“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梁 涛	59
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论纲/林存光 肖俏波	68
理学与宗教/张学智	92
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的公民道德教育/王殿卿	119
中华文化的复兴/周桂钊	149
中国梦与天下观/周桂钊	172
《诗经》的史诗学解读/周流溪	180
从儒教的产生看儒教的性质/张 践	204
欧阳竟无与近代学术思想/张志强	222
广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拓展/陈立思	264
附录：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 2010~2014 届毕业论文摘要汇总	293

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

郭 沂*

王心竹老师：郭沂老师在先秦典籍研究、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出土文献的研究上可谓是学术界首屈一指的，所以我们请郭沂教授今天来给大家讲的题目是“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尤其是先秦哲学的研究中，每一次新的文献的被发掘，可以说都掀起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热潮，尤其是郭店竹简的出土，到底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有哪一些？这是学界广泛争论的非常热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郭沂老师，让他给我们细细道来。

郭沂老师：谢谢王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光临。我非常高兴和大家讨论郭店竹简和中国哲学的问题，这也是这些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很多年，也有很多的想法，我很想在这里把我其中主要

* 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著有《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孔子集语校补》《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等书，以及论文百余篇。

的想法都介绍给大家，但是时间有限，我就只把主要观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我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

一、中国古典学及其重建

我们知道钱穆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对我们历史和传统抱着温情与敬意”。这个说法对我来说非常震撼。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的历史、不了解我们的传统，就枉做一个中国人。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存在于典籍当中，而典籍又往往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中国古典学可谓命途多舛，曾多次由于种种原因遭到致命的破坏。当然学者们不会任其放失的，他们想方设法进行重建。

春秋以前，有关三代历史的记述，主要保存在《诗》《书》《礼》《乐》等典籍之中。但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到孔子的时候，《礼》《乐》荒废了，《诗》《书》也多有散乱缺失。孔子对此深感痛惜，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阐发《周易》，著述《春秋》。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先秦古典学的典范。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典学重建活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古典学重建活动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秦火之后，历史典籍丧失殆尽，古典学又有中断的危险。好在汉初废除“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于是涌现出大量先秦典籍。这些典籍，有的来自民间冒险收藏，有的来自学者口传，也有一批来自秦代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些文献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的。

总的来说，汉唐古典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先秦文献与史实的整理和梳理；二是对这些文献和史实的诠释和发挥。其基本方向是对先秦古典学的恢复和发展。

至北宋中叶，汉唐传统古典学的两个方面都受到严重质疑。

宋代开始的这种疑古思潮，时起时伏，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算是登峰造极了。1923 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先秦两汉古书所载古史都是传说，因而他立志推翻这个古史系统，从而还原其传说的本来面貌。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古典学重建工作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是同步的。1917 年，王国维先生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使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视为子虚乌有的记载重新得到证实，开始了古典学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一直为学者所遵信，成为其后古典学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肇始于 20 世纪初叶的这种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传统古典学重新判断工作，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如果说前两次古典学重建是古典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其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释传统文献的话，那么第三次的重建是古典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其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同时纠正和补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

就第三次古典学重建的历史过程而言，我以为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标志着这股学术思潮的确立，而几年前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成为历史。

那走出疑古时代后走向何处去呢？李学勤先生曾经谈到应该是冯友兰先生的释古，我对这个看法不能完全赞同，因为冯友兰先生的释古是以疑古为基础的，他认为信古已经被抛弃了，没有任何价值了。整个历史研究，先是疑古，就是对于文献史料的审查，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是释古，即对史料融会贯通。就是说释古的基础还是疑古。所以，和疑古一样，释古也犯了疑古过勇

的错误。依据现在的出土文献，可以发现冯友兰先生的很多判断是错误的。例如，他认为老子其人其书都很晚，是战国末期的，但郭店竹简《老子》出土以后就完全否定了这个看法。再如他说《大学》《中庸》很晚才成书，晚至秦汉之际，但郭店竹简也对这个说法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郭店竹简的一些儒家文献所讨论的问题和概念与《大学》《中庸》是一致的。如果说郭店竹简是可靠的早期文献，那么我们说《大学》《中庸》时代也应该是很早的。因此释古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针来对待古史、重建古史呢？

多年以前我提出“正古”这个说法。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典学。“修正”传统古典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典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我提出了“四正”：一是反正，即拨乱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典学是基本可靠的，不可轻易怀疑，这是前提。根据出土文献“证明诸书”，拨乱反正，重新认定传统古典学的正确地位，乃当务之急。二是纠正，也就是传统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需要纠正。三是补正，即“补”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典学也有所缺失，尤其经过秦火，当有大批先秦文献佚失，需要根据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补足。四是判正，即“判”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典学的有些方面是不明确的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评判论证，使得其正。

二、郭店楚墓竹简与先秦哲学

因为我们这次讲得就是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那么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郭店竹简。我想郭店竹简大家可能并不陌生，这批竹简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这批竹简之所以异常珍贵，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是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和别的出土文献不一

样。另一方面由于它们的时代很早。这批竹简出土自郭店一号墓，其墓葬时代大约是公元前 300 年，相当于孟子生活的时代。下葬的时代是公元前 300 年，那么抄写在竹简上的时代一定早于墓葬时代，而文献的形成一定早于抄写的年代，这样的话，这批文献的时代应该往前推到很早了，大致可以推到战国初期，所以我认为这批文献至迟应该是战国初期的。

这批文献基本上属于儒家和道家的，其中道家主要有两种文献：一个是《老子》，这是现在看到的最早的《老子》抄本；另外一个献是《太一生水》，这一文献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流传，连司马迁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提到这篇文献。从时代上来看，它们处在道家发展史上的老庄之间。我们知道从老子到庄子大约有一两百年，在这期间道家到底是怎样发展的，不是很清楚。我们有了这批竹简，就可以对这个阶段道家的演变进行重新梳理。这是道家的文献。

另外一批是儒家文献，其中有《缙衣》。《缙衣》是《礼记》中的一篇。我们知道早期文献往往是以其第一句话最重要的字眼来命名的，像《论语》里“学而时习之”开头的这一篇就叫《学而》。但是在今本《缙衣》中，“缙衣”二字不在第一章，而在第二章。为什么呢？难以理解。这个问题有了郭店竹简就得到解决了。在郭店竹简里的《缙衣》没有今本的第一章，第一章就是今本的第二章，原来今本第一章是“飞来之物”。也就是说，《缙衣》还是以首章第一句话来命名的。

然后是《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在历史上这几篇都没有传下来。《五行》也是涉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荀子·非十二子》说过：“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但思孟的“五行”到底是什么？从汉代以来学者们就认为“五行”就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个说法为后来的学者所深信。在《五行》篇出土以后这问题才真相大白，原来过去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五行”不是

仁、义、礼、智、信，而是仁、义、礼、智、圣。这篇文献在郭店竹简里出现，在这之前已经在马王堆的帛书里出现过，说明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很可惜它没有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再就是《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这些文献也都没有流传下来。

我们知道孔孟之间的儒学是非常繁荣的，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孔子死了以后儒学有八派之多，这八派是什么情况，有哪些典籍，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了。从孔子到孟子在儒学的发展史中也有差不多一两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个空白。但非常幸运的是，郭店竹简中的儒家文献正好是出现在孔孟之间的，所以对我们了解孔孟之间的儒学发展是非常有帮助。

除了儒家和道家的文献之外，还有四篇非常特别，整理者把它命名为《语丛》。这几篇的文献性质，大部分学者归之为儒家，但是我感觉这里不只是儒家的，也有道家的内容。按照我的理解，这四篇应该是墓主的札记。也就是说，前边所谈的道家文献和儒家文献本来收藏在这个墓主的小图书馆，是他生前经常读的书。在阅读过程中，他有一些体会，便把这些体会写下来，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语丛》。这是他对儒家、道家文献的理解和体会。所以这四篇作为札记的《语丛》竹简形制都很短，不像前边介绍的竹简那么长，因为按照古书惯例，竹简越长文献地位越高。这位墓主很谦虚，没有把自己的札记写在长简上。

三、孔子与《周易》

新出土的文献，当然涉及马王堆帛书，最重要的是郭店这些重要文献，对先秦的史实和典籍，对先秦哲学的问题，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视角，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就简单地谈一下我据此对先秦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史实的看法。

关于孔子和《周易》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悬

案，司马迁和《汉书·艺文志》都提到了孔子和《周易》的关系，尤其是和《易传》的关系。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易传》包括《十翼》都是孔子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直到北宋时期大文豪欧阳修写的《易童子问》首先怀疑这个说法，他认为《易传》中只有《彖传》和《象传》是孔子作的，其他各篇都和孔子没有关系。到了近现代，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就越来越严重了，现在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就是孔子和《周易》没有任何关系，孔子没有研究过《周易》，更没有写过《易传》。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好多古书都记载了孔子和《周易》的关系，像《史记》的《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帛书《要》篇也有很多的记载。

当然问题也很多，如“五十以学《易》”在《论语》里有异文，在汉代的《鲁论语》中，这个“易”字作“亦”，这样这句话就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据此，孔子和《周易》就没有关系了。我很多年前研究过《论语》的成书和演变，对《论语》的传本有所了解。这个字在《鲁论语》作“亦”讲，而《古论语》作“易”，郑玄“从古”，订正为“易”。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搞清楚《古论语》和《鲁论语》的关系。按照我的研究，《古论语》就是《鲁论语》的原本，也就是说《鲁论语》是《古论语》的转抄本，《古论语》更加原始，在遇到异文的时候，当然要以《古论语》为准，所以这个地方作“易”是没什么疑问的。

不过，在承认“五十以学《易》”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这句话，又有很多的争论。从“五十以学《易》”这句话看，孔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学的？很多人认为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学的，意思是说再过几年，等我五十岁的时候学《易》就没有大过了。但问题是，孔子明明知道学习《周易》可以无大过，那为什么不马上学，而要等到五十岁的时候再学呢？这个问题没法解决。按照我

的看法，这是一个假设，既然是一种假设的话，那么它可以往前推，也可以往后推，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是向前推而不是向后推的，意思就是“让我再年轻几岁，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就学习《周易》，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也就是说，孔子是在自己六十岁之前说的。关于“大过”，过去学者们认为孔子是圣人，不会有什么大过，孔子这样说是谦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这是他总结一生所说的，肯定是意识到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有很严重的错误。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按照我的看法，孔子的大过就是周游列国这件事。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没有什么建树，他本来想在这期间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没有哪个国君真正采纳他的意见，到处碰壁，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在六十岁之前就想回国，但是由于鲁国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他没能回去。鲁国曾经招冉求回国，子贡告诉冉求“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老师回去”。这说明当时孔子已经意识到周游列国是一个“大过”，所以非常想回鲁国，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从事教育和整理典籍。

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就涉及《易传》的成书问题。《易传》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像汉唐时期所说的整个《十翼》都是孔子所作的？对《十翼》的成书和时代问题，我曾花了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十翼》基本上包括两部分，有一部分比孔子还要早，我把它叫早期《易传》，像《彖传》《象传》，读起来感觉语言非常古雅，思想也非常朴实，言简意赅，应该早于《论语》。另外一点，我们知道世界各国最早出现的作品为韵文，后来才有不押韵的散文。《彖传》《象传》里边有好多韵文，这也是它时代较早的一个标志。《易传》的另外一个部分反映了孔子思想，我称之为孔子《易说》，这里边有孔子写的《易序》等文献，也包括孔子弟子记载的孔子言论，多被标之以“子曰”。在标以“子曰”的史料中，有一段提到“颜氏之子”如何如何，显然是孔子的口吻。谁有资格说颜渊为“颜氏之子”呢？只有孔子，所以这些“子曰”的“子”应该是孔子。

在《系辞》中，称“子曰”的这部分和没有称“子曰”的这部分的思想是一致的，应该都属于同一个人的思想，这个人当然是孔子。

看来，《易传》十篇的时代都很早，最晚也不迟于孔子。这个看法和现在流行的观点很不一样，绝大部分学者还没有接受，但我注意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我这个看法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接受这个看法，因为我有充分的根据。

还有学者坚持汉唐时期的传统观点，认为《易传》十篇都作于孔子，以金景芳先生为代表。在先秦儒家典籍当中，哲学造诣最高的就是《易传》。金先生认为，像《易传》这么高深的著作，除了孔子没有人能写出来。当然这是他对孔子的维护，也不是没有道理。先秦诸子的著作，尤其那些思想性较强的著作，我们都知道作者，为什么单单《易传》这部哲学性这么强的书我们不知道作者呢？所以金先生宁愿相信传统的说法。

四、《论语》及《论语》类文献与孔子思想

关于《论语》，我在1984年本科毕业即留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点校整理孙星衍的《孔子集语》。通过点校《孔子集语》，我对有关孔子的文献有了新的了解。长期以来，研究孔子主要靠一部《论语》，但事实上除了《论语》之外，我们的典籍里有大量的关于孔子的记载。对这些记载，现当代学者一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假托的，并不是真正的孔子言论。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论语》以外的文献和《论语》的文献思想很一致，语言风格和概念也非常的一致。如果说《论语》代表孔子思想的话，那么也应该承认《论语》之外的这批文献也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我就提出“《论语》类文献”这个概念。我1988年硕士毕业，专业是历史文献学，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孔子文献研究》。

什么是《论语》类文献？就是在西汉以前的典籍里连续记载“子曰”的那些文献，它们和《论语》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孔子言论。因为是连续称“子曰”，从上下文看，绝非某位作者的征引。《论语》类文献的价值应该和《论语》是不相上下的。我这个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但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接受。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刚才谈到郭店竹简里有一篇《缁衣》，我们知道《缁衣》是《礼记》里边的一篇，通篇标之以“子曰”，按照我的看法，它属于《论语》类文献。过去人们认为《礼记》是汉代成书的，并不是先秦的，所以《缁衣》里的这些“子曰”本当作假托，或者说是赝品。现在我们在郭店竹简里发现了《缁衣》，这样一来，《缁衣》为汉人假托孔子语的说法不攻自破，这就从侧面证实了我对《论语》类文献的判断，我想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我的这个观点。

如果根据我所说的《论语》类文献去研究孔子，那我们对孔子会有一个重新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知道，今本《论语》中，孔子非常重视修养，所以我推断今本《论语》很可能是孔子德行科的学生记录整理的。韩非子曾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儒学分化达八派之多，那他们的观点已经差别很大了，因而，各派孔子弟子很难坐在一起编一部《论语》。《论语》的编辑，应该是小集团内部的事情，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把平时的笔记整理编成一部《论语》。我想在《论语》编者之外，也会有其他的集团，他们也会整理平时听孔子讲道的笔记，形成他们的《论语》。按照我对孔子的文献尤其是《论语》类文献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的思想应该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过去研究孔子往往是平面化的。孔子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有人说是仁，有人说是礼，还有人说是中庸，如此等等，我想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是又不确切。

按照我的看法，孔子思想应该是有三个发展阶段。早年是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中年是以“仁”为核心的内省思想，

晚年时以“易”为核心的形而上思想。关于“易”的概念，像高亨、金景芳等研究《周易》的大家，在《易传》里边一看到“易”字就马上加上书名号，这个是很大的误会。“易”是一个哲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老子的“道”的概念。“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我总不能说是《周易》这本书里有太极吧，这样理解是非常荒唐的，所以这个“易”并不是《易》这本书，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先生这样理解，因为《系辞》本身对这个概念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说“易之为书也”如何如何，“易之为道也”如何如何，也就是说，“易”这个概念有时候是指《易》这部书，有时候是指作为哲学概念的“道”。

孔子曾经自称“下学而上达”，我想这是孔子对自己思想演变过程的概括。从“礼”到“仁”到“易”就是一个下学而上达的过程，“易”是最高的，是形而上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论语》的编排，我们知道《论语》的第一章是“学而时习之”，它所强调的是学，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然是礼乐制度，是周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传统文化，这是他治学的第一阶段。《论语》最后一篇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是上达。“知命”是学易的结果。因此，《论语》一书的编排，基本上反映了孔子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

这又让我想到了孔子对其一生的总结，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孔子对自己一生的这个总结和我总结的这三个阶段存在什么关系呢？“十五而志于学”主要是学“礼”，这个阶段主要是以“礼”为核心的教化思想，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然后“三十而立”，我认为是指孔子提出了他的“仁学”。我们知道，“仁学”是孔子的创造，是对“礼”的一个深化。“礼”是一种外在的规范，那我为什么要遵守“礼”？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许多人不遵守“礼”了，怎么办呢？孔子发现“礼”缺少一个心理基础，完全是一种外在规定，我为什么要

遵守这个规定呢？于是孔子就提出了“仁学”作为“礼”的心理基础，就是说不按照礼去做，你就内心不安，你就不仁。我们知道宰我和孔子争论三年之丧，宰我说：“时间太长了一年就行”，孔子说：“你父母去世了，三年之内如果你吃得很好，穿得很好，那你心安吗？”宰我说：“我心安”，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在这种情况下，你仍能心安，说明你没有仁心。三年之丧本来是“礼”，但孔子用安与不安这样的心理状态来表达“仁”这个概念，也就是为“礼”找到一个心理基础。可以说从“礼”到“仁”是一个从外到内的过程，从“仁”到“易”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这是孔子思想的变化。《史记》也谈到孔子思想的变化，早年孔子是“以诗书礼乐教”，而晚年是“晚而喜《易》”等。

五、儒家八派

刚才我提到，韩非子说“儒分为八”，郭店竹简这批出土文献对我们研究早期儒学尤其孔孟之间时期的儒学有什么帮助、提供了什么新的线索呢？让我们先看一下韩非子是怎么说的。他说孔子死后儒家有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八儒到底指的是谁，现在已经不能完全搞清楚了。现在能够肯定的只有几个，子张为孔子弟子，子思为孔子之孙，漆雕氏为孔子弟子漆雕开。至于其他五位，就难以落实了。像颜氏，孔子弟子中有八个姓颜的，按照郭沫若的看法，不一定是颜回。

关于子思之儒，按照传统的看法，子思作《中庸》，这是《史记》的记载。但是近现代以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就连冯友兰这样的著名哲学家也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他说《大学》和《中庸》都是秦汉之际的作品。我刚才谈到，冯先生的这个看法在郭店竹简出土后被否定了。

按照我的研究，子思的著作应该包含三类，第一类文献是子思记载的孔子言论，属于《论语》类文献，这涉及《中庸》的成书问题。在郭店竹简出土以前，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大学》和《中庸》，我发现今本《中庸》本来包含两篇原始文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文体不一致，有两种文体，一种是记言体，标有“仲尼曰”“子曰”字样，连续记载孔子言论，显然属于我说的《论语》类文献。另一种就是议论体，包括“天命之谓性”的第一章，还有二十章之后的部分，这是一篇哲学论文。记言体和议论体两部分的思想内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判断它本来就是两篇。

我们知道，现在传下来的先秦时期的典籍，是经过汉人整理的，在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都乱套了，有的丢失了，由汉人重新整理，整理过程很可能也很容易把本来不属同一篇的文献合为一篇。我们现在整理出土文献仍然会出现这种现象，例如在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公布以后，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分篇和编排方案。我想《中庸》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把本来属于两篇的合为一篇。《史记》说“子思作《中庸》”，这说明《中庸》这个篇名是存在的。那么这个篇名是属于哪一篇呢？是记言体这一部分呢还是议论体的这一部分呢？我认为是记言体这一部分的篇名。还是我刚才说的，先秦文献经常以第一句话的重要字眼来命名，今本《中庸》第一句话是“天命之谓性”，这里边没有“中庸”二字，所以这肯定不是原本《中庸》的第一章。我们非常幸运地在今本《中庸》的第二章读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所以我认为这是原本《中庸》的第一章，就是说原本《中庸》事实上是记言体的那部分，是《论语》类文献。另外一个旁证是，梁朝的沈约曾经说，《礼记》里边的《缁衣》《表记》《坊记》《中庸》四篇来自《子思子》，把这四篇一起说，这说明这四篇的文献性质是相同的。我们知道除了《中庸》以外，《缁衣》《表记》《坊记》这三篇都是标以“子曰”的文献。照理